

投稿類別：文學類

篇名：

認同・記憶・創傷——以鄭清文〈三腳馬〉為例的多向度考察

作者：

楊詠淇。台北市私立景文高中。普通科三年級 2 班

指導教師：

吳翊良老師

陳泰岳老師

## 壹、前言

### (一) 研究動機

生長在臺灣這塊土地的我們，卻對自己的「身分認同」有著許多模糊地帶的糾纏。中國文學／臺灣文學／西方文學／現代文學的交會與對話，都讓島嶼的文學聲音更加明亮與多元。常常在上國文課的時候，總是記得中國各個朝代的著名詞人、詩人、古文運動、唐宋八大家之類的國學知識；但是，上到臺灣近代文學的作品卻是一點概念也沒有。

連橫《台灣通史·序》：「汝為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事」。鄭清文，臺灣重要的文學作家，鄭清文（1932-2017）生於台灣桃園。小學受日本教育，初中開始學華文。畢業於台大商學系後入華南銀行直到退休，其間還寫作四十多年未曾中斷。初作〈寂寞的心〉（1958）在《聯合報》副刊發表後，不但陸續出版，還連獲國內外文學獎。如 1968 年《臺灣文藝》第四屆文學獎、1987 年第十屆吳三連文藝獎、1993 年第十六屆時報短篇小說推薦獎。1999 年《三腳馬》英譯 (Three-legged Horse) 是台灣作家首次獲得美國「桐山環太平洋書卷獎」的小說獎。2003 年獲世界華文文學終身成就獎。所選乃 12 篇台灣人遭逢戰亂、誤解受創的短篇故事。〈三腳馬〉是有關日據時代，一位為報復村裡小孩取笑他，而成為日警線民。戰後，他彫刻了許多殘缺不全的馬。其中一只三腳馬散發出難以言喻的痛苦和懊悔，反映出他永難平靜的內疚。（註一）

### (二) 問題意識

鄭清文對於臺灣這塊土地的關懷與重視，在他的作品中屢見不鮮，他也書寫日本殖民治理的歷史。學界已有鄭清文的長篇小說研究（註二），但 1979 年的短篇小說〈三腳馬〉，其中所闡述的「民族意識」、「身分認同」、「殖民歷史」、「身世感懷」、「創傷記憶」，至今仍是方興未艾的議題，值得深入探討。本文希望藉由分析《三腳馬》這篇短篇小說，從幾個方向來論述：

1. 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們，假如他們被問到「你是誰？」的時候，聽到他們的回答、看到他們的行為、甚至對自己的身分認同，會是什麼答案？
2. 〈三腳馬〉中的「白鼻狸」（曾吉祥）所雕刻的「三腳馬」，其象徵究竟是什麼？
3. 〈三腳馬〉作為反映日治到戰後的「殖民史文本」，如何看到當時人民的身分認同、歷史記憶、內心創傷？

希望透過這樣的解讀，我們能對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文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理解與寬容。

### （三）研究方法

#### 1. 主題研究

在本論文中，我會以〈三腳馬〉為中心，從三個主題進行分析：

- （1） 認同
- （2） 記憶
- （3） 創傷

這三個主題都環繞著主角曾吉祥的命運，結局更扣合日治時期台灣底層人民的身分認同與歷史記憶。

#### 2. 跨學科研究

〈三腳馬〉涉及了短篇小說中的人物刻劃，由於時代背景的關係，也讓角色的性格更加豐富與多元，我也會借用學者的殖民地歷史研究、心理學分析等跨學科的角度，來探討這篇文章中的角色塑造。

## 貳、正文

### 一、認同

#### （一）自我認同

故事的主角為「白鼻狸」，真實名字叫做曾吉祥。相較於賴和的〈一桿稱子〉中的主角秦得參的命名為閩南語——「真的慘」——的諧音，以名字反映了故事中的處境和命運；曾吉祥的「吉祥」在〈三角馬〉的故事裡卻是與他的處境背道而馳，甚至帶有嘲諷與對照的況味。

「白鼻狸」這個綽號是來自於曾吉祥臉上有道白斑。在童年時期，某次阿福伯抓到了一隻白鼻狸，最小的兒子阿金也是曾吉祥的朋友，第一次叫他「白鼻狸」的人就是他。不知不覺，隨著讀者跟著情節的循序漸進，不只是曾吉祥在經歷童年時期遭受語言霸凌或是欺辱時，大家都逐漸忘記了他的名子。曾吉祥國小畢業去阿舅的食堂幫忙，其中一段強烈的表示他內心的感受：

為什麼？為什麼每個人都叫他白鼻狸呢？他想離開故鄉，也是因為在那裡

每一個人都叫他白鼻狸。來到城市裡，認識的人不多，但只要一熟，就又叫他白鼻。」(註三)(鄭清文，2006年，頁56)

自我認同的迷茫，在童年期的創傷中生成，再加上日本殖民台灣背景之下，台灣人的教育程度受限(會發現故事中沒有日本人在對待曾吉祥有「白鼻狸」這樣的說詞出現，只有針對他的出身與外表進行體罰)，能夠在哪裡找到自我的認同？誰不會叫他「白鼻狸」對他瞧不起？那就是日本警察，這讓他找到了他的發洩出口。比方說，曾吉祥逐漸向日本警察靠攏的一段：

這時候，他更清楚地覺得，人分成兩種，一種是欺負人的，一種是受人欺負的。井上先生是前一種，自己是第二種。但現在，他親眼看到那幾個店員由第一種變成第二種。但現在，他親眼看到那幾個店員由第一種變成第二種，而自己又好像從第二種變成第一種。」(鄭清文，2006年，頁58)

曾吉祥第一次向日本警察舉報一群臺灣人賭博一事。從被霸凌變成霸凌的人，權威掌握了那些人，日本警察稱讚他你是個「好日本國民」，那時候還是小學生的他並不是那麼地在意這個標籤，然而，隨著他決心成為日本警察主導權威的時候，「自我認同」與「國家認同」彷彿被放在天秤上，白鼻狸寧願做一隻三腳馬——成為日本人的走狗，失去了自我認同也沒有了國家意識。

## (二) 游移於臺灣／中國／日本的國家認同

小說中有一句話：「當時，台灣人稱日本是狗，是四腳，替日本人做事的走狗，是三腳。」曾吉祥舉報給日本警察有群臺灣人賭博一事的時候，他的阿舅很不高興。日治時期，在教育、生活、工作都有不成文規則或是限制存在。阿舅為什麼會不高興？正文中他提到：我們應該規規矩矩的過生意。顯然比起那些被舉報的台灣人釋放出來後回來威脅，他更在意的是，不希望曾吉祥變成日本警察的線民一事。

雖然在故事中，沒有很多描述台灣人在日本殖民背景下(到戰敗消息傳來之前)，他們抱持的態度，是不想被日本人沾到一點關係、懼怕日本警察。曾吉祥和妻子吳玉蘭討論到結婚的儀式時，遇到了女方的父親堅持要使用中式傳統儀式和皇民化運動下推行用日本的儀式結婚的衝突。妻子吳玉蘭的身分是經過中學校教育的台灣人，父母是鄉下人，「妳是受過教育教育的人，不能像那種無教育的人。」曾吉祥心中覺得他們都是受過日本教育薰陶出來的台灣人，吳玉蘭沒有贊同使用日本儀式卻也沒有完全否決掉中式傳統儀式，只說了句：「我會盡力勸他們」。由此，可以看出曾吉祥與吳玉蘭之間，對婚嫁儀式的看法截然不同。

那麼，關於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一事，台灣人和日本人又是怎麼看呢？

「日本輸了。」，「日本輸了。」很短的話被刻意重複了兩次。凸顯出臺灣人在被殖民解放的當下，不知道如何是好；「雖然大家都知道日晨早會投降，但大家都沒有預料到今天。」有的台灣人還是在搞不清楚狀況；有的台灣人卻聽著收音機時聽著日本天皇涕泣，也跟著一起泣不成聲。日本在當時的背景之下抱持著「軍國主義」甚至是「武士道」不怕死的精神，聽聞主國戰敗投降，長崎、廣島投下原子彈，莫過於是對他們國家極大的挫敗和恥辱。第二天，有日本上級長官和官員，紛紛切腹或是上吊自殺，寧願自己先結束掉生命，也不想被曾經欺辱瞧不起的台灣人弄死。

「日本已沒有國家了，難道還會管我？」（鄭清文，2006年，頁81）

在曾吉祥自己的認知中，他是臺灣人，只不過擔任了日本警察，這個效忠的國家是臺灣還是日本，對他而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擁有權力才能擺脫被霸凌的厄運。只是好景不常，二戰後日本潰敗，就臺灣人來說，他是為日本人效命的罪人。那麼，究竟曾吉祥是臺灣人，還是日本人，還是其他人心中的中國人？這裡可以從小說中提到的「皇民化運動」來驗證：

「妳的決定很重要。在台灣，還沒有這種例子。寶貴就寶貴在第一次。妳可能還不知道。政府正在計畫推廣皇民化運動。以後，不但要按照日本的儀式結婚，還要拜他們的神，還要改姓名，譬如說，我姓曾，可以改成曾我，曾我兄弟的曾我。你們姓吳，日本人也有，不過很少，而且讀法不同。要徹底皇民化，最好也要改個姓。日本現在已把南洋的許多地方占領過來，以後我們都要去南洋，那地方太大了，我們去做指導者。」

（鄭清文，2006年，頁66-67）

從姓「曾」到改成日本人的「曾我」，沒有人能夠清楚說明，也沒有辦法將曾吉祥的身世截然劃分，這樣錯綜複雜的關係，游移於臺灣／中國／日本的國家認同，也難怪主角要從「三腳馬」變成了「四不像」了。

## 二、記憶

### （一）自卑的童年記憶

曾吉祥的童年，有段關於他翹課路途中，經過鐵軌，第一次看到蒸汽火車跟在後頭奮力奔跑的情節：

他猛然過去，起身退到山邊。火車從他面前急擦過去。他什麼都看不清楚。火車過去之後，才覺得車上有人看著他，對他笑著。

（鄭清文，2006年，頁51-53）

排除掉被取「白鼻狸」這個綽號和被欺負的記憶，曾吉祥的想法是單純的。他不懂為什麼井上老師特別針對他，於是翹課逃避一切；第一次看見蒸汽火車，他拔腿追了過去，火車就在他面前，他追著，追著；小學一畢業來到台北找阿舅的食堂打工。一直到第一次向舉報日本人舉報事件，他轉向權威低頭，成為日本警察。他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再叫他白鼻的」的要求。也因為這樣霸凌現象，使得他的童年更加灰暗蒙上陰影。長大後，他體認到：

這時候，他更清楚地覺得，人分成兩種，一種是欺負人的，一種是受人欺負的。井上先生是前一種，自己是第二種。但現在，他親眼看到那幾個店員由第一種變成第二種，而自己又好像從第二種變成了第一種。

（鄭清文，2006年，頁58）

為了擺脫這樣的自卑與不堪，他決定要當上日本警察，小說敘述：

在裡面的人，從來沒有叫他白鼻的。當然，他是要站在木格子的這一邊的。但他不是要做一輩子的工友，也不是一輩子的線民。他要把這木格子擴大到整個社會。他要做警察，只有這樣，所有的人才會尊敬他，才會畏懼他。

（鄭清文，2006年，頁62）

根據海明威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1899-1961) 的自述，「一個作家最好的早期訓練是什麼？海明威回答說：不愉快的童年。」波蘭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瓦迪斯瓦夫·萊蒙特 (Wladyslaw Reymont, 1868-1925) 同樣刻劃出童年的窮困經驗與閱讀書本帶來的啟發。主角曾吉祥的「童年經驗」因鼻梁上的白斑紋，而延伸的自卑感與恐懼感，使得他必要當上日本人，才能洗脫負面的童年回憶

## （二）從邊緣到中心的權力變化

曾吉祥訂下目標——當上日本警察後——他的處境與地位，漸漸地從邊緣轉向了中心，比方說，當上警察後，他開始對待庶民同胞，回以更加嚴厲地對待與苛責：

1. 「我因為要他（伯叔）做一個書桌，他遲疑了一下，我就打了他一個嘴巴，他年紀比我大。但我還是打他。我的背上揹負著一個國家。我當時這

麼想著。我還記得他看我的眼神。那眼睛充滿著憎惡和忿恨。但，我覺得權威比仇恨還要強大。(鄭清文，2006年，頁91-92)

2. 「我也記得那個叫柴扒鳳的女人。她應該是你們的鄰居。在領配給豬肉的時候插了隊，我就叫她跪在大家面前，頭上還頂著一木桶的水。既然是配給，每個人都可以買到。卻有人一定要插隊。這本來是一件小事，我也可以裝著不知，但我曾經聽日本人指著這一點，貪小便宜不惜破壞秩序的這一點，指責台灣人的愚蠢和無教育。以前，日本老師以這樣的眼光看我，我卻很快學會以同樣的眼光看自己的同胞。(鄭清文，2006年，頁92)

3. 「我也記得那個叫阿灶的屠夫。有人密告他豬肉裡灌了水。他不承認，我就叫他吃水。現在，我還聽得到他哀叫和求饒的聲音。  
(鄭清文，2006年，頁93)

有權勢與地位，能夠控管箝制人民的曾吉祥，當他有了權力之後，反倒變成加害者忘了以前曾為被害者的命運，「以前，日本老師以這樣的眼光看我，我卻很快學會以同樣的眼光看自己的同胞。」伯叔、柴扒鳳、阿灶這些底層的社會民眾，就是用來凸顯出曾吉祥從邊緣到中心的權力變化。

### 三、創傷

#### (一) 妻子的犧牲帶來的內疚悔恨

日本戰敗後，曾吉祥遁逃，徒留髮妻（吳玉蘭）面對社會大眾的責難：

那時，被日本禁止已久的子弟戲開始復出，爆竹的聲音已替代了炸彈的聲音，大家都可以再聽到鑼聲和鼓聲。民眾開始在各廟寺行香，答謝眾神賜給平安。在慈佑宮的對面，靠著河堤邊的地方搭著戲台，戲棚的前簷上用紅紙寫著「民族罪人曾吉祥敬奉」幾個大字。在戲棚前和廟前之間，用平底籬一籬一籬放滿香菸，輝煌的燈光，把這一條通道照得有如白天。每一籬香菸上面，都掛著紅旗，同樣寫著「民族罪人曾吉祥敬奉」幾個大字。他的妻子玉蘭就跪在廟上向全鎮民謝罪。(鄭清文，2006年，頁87-88)

「聽說，在面對著狂暴的民眾，她是那麼鎮靜，那麼勇敢。她以一個弱子，為了我這個人，擔負了民族罪人的重負。民眾罵她，她向民眾求恕，但不是為了她自己。有人唾她，她也不去拭擦。我是一個男人，卻讓自己的女人出醜受辱。

「難道她不會有怨言嗎？我連見她最後一面也不能夠。她就是有怨言，又如何申訴呢？我不知道她是怎樣瞑目的。」

（鄭清文，2006年，頁97-98）

以夫為貴的妻子犧牲了自己，讓曾吉祥逃離舊鎮，但這也成了他一輩子內心深處最遺憾的內疚與悔恨。

## （二）三腳馬的象徵：自悔、自責、自憐的愧疚心態

當敘述者問曾吉祥為何要刻「三腳馬」時，曾吉祥是這麼回答的：

「你刻那些馬，是一種自責？」

「當時，台灣人稱日本是狗，是四腳，替日本人做事的走狗，是三腳。」

「你為什麼只刻馬？而不刻其他的動物？」

「因為他們要的是馬。我刻著，刻著，突然間，好像在那些馬身上看到了自己，所以就試著把自己刻上去。」

我把地上、牆角的馬一隻一隻拿起來，雖然每一隻的姿勢都不一樣，卻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牠們的表情和姿態都充滿著痛苦和愧作。

（鄭清文，2006年，頁105-106）

由以上的對話可以推敲：曾吉祥=三腳馬=日本人走狗=沒有生命的木刻塑像，也就是說作者藉由「三腳馬」這個象徵，以明喻暗喻的方式（註四），完成了「曾吉祥=三腳馬=日本人走狗=沒有生命的木刻塑像」的重疊象徵，也同時帶出了曾吉祥內在自悔、自責、自憐的愧疚心態。

## 參、結論

大多數人都讀過楊逵的〈送報伙〉，小說中結合了他所介入的農民運動的社會經驗以及日本政府為了鞏固殖民統治，加速帝國主義的擴張。（註五）到了戰後的現代小說家鄭清文，藉由日治時期的台籍民眾曾吉祥，從他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一路寫下，也見證了日本殖民時期的歷史景觀。如果那時候問舊鎮的臺灣人：「你是誰？」，他們究竟是用日語回答還是那口流利的臺語喊道自己是台灣人呢？「我是誰？」此時曾吉祥才領悟到，卻已經懊悔終身，徒留喟嘆。本論文之結論有底下幾個：



### (一) 個人心得

第一次閱讀完了《三腳馬》，再次感受到短篇小說能勝過一本本章回小說的魅力所在，甚至在鄭清文的筆下，他所道出的是只有台灣文學才能夠表達得淋漓盡致的「國家認同」的問題。第二次仔細精讀後，對於「三腳馬」的意義開始有了疑問和想法。譬如影視和文學作品常常會出現「馬」的象徵，《銀翼殺手》中的摺紙馬暗示了主角戴克可能隱藏的身分和他的內心精神意象。「三腳馬」是曾吉祥（白鼻狸）的身分與象徵，「白鼻狸」沒有面子去面對這塊土地，在「日本警察」的權力中腐化，他晚年隱居山林中，雕刻跛腳的馬，最後主角在他的工房中選的那隻最生動的跛腳馬，就是他在生命中最痛苦的時候所雕刻出來的「三腳馬」。而那隻馬，走過日治時期、二戰離亂、臺灣光復，見證了臺灣文學的繽紛景觀與多元身世，相關課題，也是未來可以再討論的方向。

### (二) 身分認同

在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們，假如他們被問到「你是誰？」的時候，聽到他們的回答、看到他們的行為、甚至對自己的身分認同，會是什麼答案？本文發現這是一個令人困惑難解的問題，當時的人徬徨游移在臺灣／中國／日本的國家認同，身世命運是錯綜複雜難以截然劃分的，這也造成了自我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障礙與糾葛。

### (三) 歷史記憶

小說中書寫了曾吉祥「自卑的童年陰影」、「從邊緣到中心的權力變化」、「回到當下的真實處境」，描繪出了日治時期、二戰離亂、臺灣光復的歷史記憶，以及個人面對國家動盪時的心靈狀態。誠如論者所述：「作者凝視生命痛苦的事實，及自我救贖之必要，他沒讓曾吉祥在日本戰敗後就自殺死亡，他讓曾吉祥苟活著，讓他刻著一隻又一隻的三腳馬，這過程雖然苦痛卻是解除苦難必須付出的代價。」（註六）

### (四) 精神創傷

曾吉祥因「妻子的犧牲帶來的內疚悔恨」，陷入「自悔、自責、自憐的愧疚心態」，曾吉祥的壓抑與愧疚，從他刻的馬，可以看出端倪：

我一直以為不再會有眼淚了。但那天晚上，我哭得連枕頭都濕了。早上，我一起來，就決心把所有的工作推開，一心刻著一隻馬。就是你手裡的這一隻。看馬要看眼睛，你看看牠的眼睛吧。」我先看馬，再看他。他那乾

溷無神的眼睛突然濕潤起來。(鄭清文，2006年，頁108)

雕刻的木馬不會哭泣如同槁木死灰的曾吉祥，已經沒了眼淚；但在最後，敘述者與曾吉祥相對一望的剎那，曾吉祥流淚了——那是文學的力量讓情感昇華，洗滌了悲傷，更超脫了桎梏的牢籠。因為在愛之中，曾吉祥沒有了恐懼與創傷。

#### 肆、引註資料

註一：臺灣文學網作家「鄭清文」介紹，詳參網址：

[https://tln.nmtl.gov.tw/ch/m10/nmtl\\_w1\\_m10\\_s1\\_c\\_1.aspx?sid=38](https://tln.nmtl.gov.tw/ch/m10/nmtl_w1_m10_s1_c_1.aspx?sid=38)

註二：謝采伶：《鄭清文長篇小說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註三：鄭清文著：《三腳馬》（台北：遠流，2006年）

註四：大衛·洛吉著，李維拉譯：《小說的五十堂課》（臺北：木馬文化，2006年）

註五：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2007年）

註六：鄭清文著：《三腳馬》（台北：遠流，2006年）附錄「凝視生命的真實」